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金山政协文史通讯

第七期

政协金山县委员会文史编辑组

1985年12月31日

反对林彪、“四人帮”的坚强战士朱守忠

编者按：文汇报1980年10月12日以《疆外青山埋忠骨》为题，以一个版面转载了宁夏《朔方》杂志1980年第七期关于朱守忠烈士与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斗争事迹的报道。朱守忠烈士系金山县兴塔乡（原泖桥乡）人。1934年毕业于金山县初级中学；后去沪求学，思想追求进步。建国后他入了党，一贯忠诚于人民教育事业。虽在政治上历经挫折，但他坚持党的信念不变。“文革”中，他看到刘少奇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受林彪、“四人帮”的陷害，义愤填膺，坚决为真理而斗争。在批斗和酷刑之下，他为刘少奇同志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声誉辩护，拘捕、牢狱、死刑也不为所屈。此种为真理而不惜牺牲的崇高品质和斗争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

本文是金山县中学已故教师洪文淑同志的整理稿。她生前为了搜集朱守忠烈士的材料，曾带病两次去沪，与朱的原在学校复兴中学党支部书记姚晶、朱的爱人支业青同志联系。后身患癌症在床，尚为此

耿耿挂怀。

现发表此稿亦可聊尽其余志。

朱守忠（原名继坚，守中），一九二〇年出生于上海市金山县泖桥乡，一九三八年毕业于上海市敬业中学（高中），一九四三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一九四七年起执教于上海复兴中学。

朱守忠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他十八岁时，他的祖母、父亲、母亲都被土匪杀害；当他还在读中学的青少年时期就要求进步，对旧社会的黑暗和反动政府的腐败不满；他为人正直，敢于斗争。

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朱守忠在上海敬业中学念高中时，就积极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守生运动。一九四八年十月，国民党经济面临崩溃，金圆券破产，物价飞涨，教师无法生活下去。为此，全市市立学校的教职员工被迫举行了一星期的罢教运动，出于正义感的朱守忠也积极投入这次罢教。罢教后，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复兴中学进步学生又发起了募捐救济教师的运动，反动校长及其爪牙却想从中揩油自肥，结果，激怒了全校师生。朱守忠不顾个人安危，自告奋勇，担任了教师代表和反动校长进行斗争。在斗争中，他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不久被学校地下党组织吸收参加了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地下教协”，从此，他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日夜奔忙，团结大多数教师为迎接上海解放做了大量

的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垂死挣扎、造谣诬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更加凶残的日子里，他不顾个人和家庭的安危，把他的家作为进步教师秘密集会的场所。

上海解放后，他迅速投入了党的宣传活动。他参加了上海市教育局主办的“政治研究会”，为上好学校的政治课积极学习。他还团结大多数教师和同学同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种种破坏活动作斗争。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二日，他被光荣地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艰难的战斗历程

朱守忠同志入党以后，他认识到他的生命已进入了一个光辉的里程，他把自己的全部热情和智慧都投入到党的事业中去。一九五〇年，党让他独当一面去上海财经学院开辟空白点，一九五一年担任了上海市教育局业余中教处的视导员，一九五四年，党又让他去上海速成师范学校任副校长。他常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爱人劝他注意身体，他总是笑笑说：“工作是大事，个人身体是小事，紧张一点好，不能耽误工作呀！”担任速成师范学校副校长后，他干脆把铺盖搬到学校里，连休息例假日也经常不回家，他总耐心地对他的爱人说：“工作需要我，留在学校里可以多做些事，家里有你照顾，我也放心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子女对家属也是严格要求，经常教育她们要艰苦朴素。解放后他老穿着打补丁的旧衣服去学校工作，他爱人几次要给他添置些新衣服，他总是说：“我们国家还有困难，艰苦朴素是共产党员应该有的优良品德，缝缝补补还能穿，做新衣服干什么！”

么？”学校里发动购买公债时，他总是认购最多，一认就是二、三百元。他爱人怪他认购太多影响生活，他说服爱人说：“国家还有困难，我们要为国家分忧担愁。”

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开始后，他作为学校的领导，看到在反右斗争中不断扩大斗争面，搞得人人自危，很担忧。为了维护党的政策的严肃性，他不同意有些人对稍有一些不正确的言论就无情打击的做法。不久，他被扣上“思想右倾、同情右派”的大帽子而受到了批判。一九五八年，组织上宣布撤销副校长职务，又以“支援宁夏文教事业建设”为理由，让他参加了“支宁大队”，并分配他到宁夏中卫中学任数学教师。在去宁的火车站上突然又接到了“开除党籍”的通知（作为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被开除出党），他顾全大局，忍受了个人的冤屈，带着深深的痛苦踏上了去宁夏的旅程。但他的心是永远向着党、永远热爱人民的教育事业的。他要他爱人把上海的教育刊物，每期都寄给他。他每次回沪探亲，总是搜集了许多上海教育方面的好经验带回宁夏去。他深深爱上宁夏，爱上宁夏人民。学生生活发生困难，他就拿出自己的钱和粮票给学生，还常常帮助学生补课到深夜。

一九六一年，朱守忠在上海养病，当时上级党委经过甄别，恢复了他的党籍，并通知了他本人。他回到宁夏，第一件事就是向组织上补交了多年的党费，但是，宁夏的有关领导却冷冷地对他说：“还没见到上海的正式批文。”叫他等待着。然而，谁知这一九六四年刮“甄别风”的指示下达后，上海对朱守忠的平反决定就成了一张废纸。一

九六五年，“社教”开始，他被解除了公职，清理回沪。由于他的苦苦哀求，宁夏组织上才同意把他安排到学校农场去劳动，每月只拿八元钱的生活费。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了，“红卫兵总部”发布了迁赶“坏人”的“一号通令”，在一片恐怖混乱中，他被扣上“地主分子”、“坏分子”两项帽子，强行迁赶到盐池县农村交贫下中农“监督劳动”。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清理阶级队伍”开始后，中卫中学发现，朱守忠的结论有问题，他们在盐池县一个叫“狼窝沟”的山沟小村中找到了朱守忠。从派来找他的二位老师中，他才知道外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刘少奇、邓小平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都被打倒了，朱守忠惊呆了：“不可能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统一的党，怎么一下子党里跑出两个司令部来了？这个提法真怪！”回到学校，他伏案疾书，他要为自己的生存，为恢复自己的本来面目，为回到党的怀抱而斗争。

一九六八年初，朱守忠最后一次回到了上海。

一到上海，在大街上、在里弄里，展现在朱守忠眼前的到处都是“打倒×××”、“揪出×××”、“砸烂资产阶级司令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朱守忠看到许多党的领导干部“戴高帽”、“挂铁牌游街”、“弯腰罚跪、拳打脚踢”地被残酷批斗，许多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被随意抄家，任意抄走和烧毁名贵文物和书画。他目睹这一切，深深为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忧。

朱守忠回到上海的时候，他的家庭早在政治风暴中解了体，妻子

被作为“分子”的家属赶到乡下，两个妹妹挂黑牌游了街，老守民毕业的儿子无处分配；他们住了三十年的房子被勒令搬了出去，一家四口，挤在一间不到十二平方米的亭子间里。

在那乌云密布的黑暗年代里，他那已沉冤十年的政治冤案，已无处申诉，他苦苦思索着，逐渐地使他的眼睛穿透了“文化大革命”这层漂亮的帷幕，看到了那真实的景象。答案越来越明确了。真理之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他决定回宁夏去，回到那他誓献终生的土地上去。

为真理而斗争

回宁夏后，他继续接受“劳动改造”，和其他“走资派”、“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一起劳动，他一边劳动，一边反复思考着“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切。

六八年七月的一天晚上，朱守忠当着同屋人的面，开始把他经过深思熟虑后的一系列看法，毫无保留地谈出了他自己的观点。

“首先，我对国家主席刘少奇以及中央首长和各级领导被百般丑化、揪斗毒打等野蛮做法，深为不满，反感极大；其次，对广大知识分子和民族资本家可以任意抄家抓人，没收财物，随便烧毁书籍文物等粗暴做法十分不理解，非常愤慨！”“这次文化大革命如此搞法，我怀疑是不是在党内有少数野心家、坏家伙，为了称王称霸，不惜采取杀功臣、篡党夺权、焚书坑儒的卑劣手段而制造的一场大阴谋、大悲剧，竟然将刘少奇等一批元老、忠臣一棍子打入十八层地狱，难道能够忍得吗？”

朱守忠在一九六八年某日和几个人私下谈话和所写的所谓“交代”材料中，他先后用共产党人的忠诚坦率，又谈出了以下观点：

“刘少奇同志在我的心目中，始终是个好党员。”“我对当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提出的‘意见书’拍手称好，佩服他对党的忠诚坦率，他倾诉的尽是忠言，不可多得，我为彭德怀的罢官大为不平……”

“我对陈毅说的难道全国党员就剩下中央文革几个好人吗这句话深有异议。”“从照片上，我见到罗瑞卿同志的脚骨受了重伤，用箩筐抬着批斗一直疼不通，很反感，难道连最起码的革命人道主义都不应有吗？”

朱守忠在“文革”当中说出这样一些观点，在“四人帮”横行时均属大逆不道，有杀头危险的。但他毫不畏惧，却还公开宣称：“我这个人，一向很顽固，别的事情可以迁就，就是不能拿原则做交易，我受过党多年教育，不能不坚持原则，怕斗，我就不叫朱守忠了。”为了表示自己矢志于党，守节不渝的决心，他在自己名字最后一个“中”字下面加上了“心”字，以后他所写的材料就都写上“朱守忠”三个大字。

塞外青山埋忠骨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的一个晚上，在宁夏自治区某农场的一间泥砖房内，正在召开一个批斗大会，主持会议的人，手中挥舞着“红宝书”，照例要大家跟着他高唱“万寿无疆”“永远健康”。那位被批斗者的嘴角却闪着丝丝冷笑，他，就是朱守忠。

会议主持人责问朱守忠：“你为什么要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辩护、翻案？”朱守忠大声回答：“我认为把刘少奇同志说成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证据不足，特别是报纸上公布的关于刘少奇在建党方面的一些论点，黑话并不黑，都是对的。两报一刊批判刘少奇的文章是站不住脚的。我希望有机会可以公开辩护。”主持会议者目瞪口呆，一时不知问什么好。朱守忠接着又慷慨陈词，侃侃而谈：“我对党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的提法想不通，党的组织纪律性很强，刘少奇同志的所作所为，都是事先经过中央政治局讨论的，现在摘引刘少奇的话，也是断章取义，没有从当时的具体条件出发……”。

会场上有人跳了起来，大声责问：“刘少奇宣扬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否有罪，应不应该批判？”朱守忠立即反驳：“少奇同志从来没有提到过‘阶级斗争熄灭’，这是别有用心的人强加给少奇同志莫须有的罪名。”

接着与会者中间突然有几个人气势汹汹，大声呼喊口号，提出问题责问朱守忠。他脸不变色，十分沉着，有根有据的逐条为刘少奇的“黑话”辩护。

于是，一场野蛮的暴力行为发生了，几个人涌向朱守忠，有的揪头发，有的扭胳膊，拳打脚踢，一下子就把朱守忠打倒在地。

随后不久，朱守忠被宣布“隔离”，关押在一间与外界完全隔绝的阴暗平房内。但他以写“检查交代”材料的机会，写出了他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看法。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日，“九大”公报发表后，朱守忠仔细阅读了公报，经过反复思索，随即他写道：我对六九年四月二日召开的所谓“九大”，是有不同看法的，理由是：

一、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的杰出代表——刘少奇竟被以最卑鄙的手段排除在外，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令人十分遗憾。

二、“文化大革命”以来，全国所有基层党组织在暴力冲击下，已全部陷于瘫痪状态。“九大”的有些代表是不符合党章规定的，没有资格当代表。

三、我不同意林彪当接班人。

四、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居然把林彪的名字写进了党章，这还算什么共产党党章？从根本上违反了党的原则。我看这就预示着“九大新党章”不久即将随同这位“接班人”及他的所谓“政治报告”一起扫进垃圾箱……。

没多久，厄运很快降临了。一九六九年的四月十九日下午，开来了一辆吉普车，宣读了保卫部“〇五”号拘留证，朱守忠被戴上手铐关进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机关——看守所。

朱守忠被关进看守所后，同年八月五日向他宣读了判决书：“……书写反革命文章……恶毒攻击林副主席……公开为刘少奇翻案叫屈……判处无期徒刑。”

被判处无期徒刑以后，朱守忠在监狱中，又继续写下了被“审查”的“交代材料”，更加猛烈地抨击林彪、江青篡党夺权的累累罪行。

一九六九年十月，农场向上级呈报了判处死刑的材料。

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下午，朱守忠接受了最后一次审讯。下面是审讯中的最后几句话：

问：你今后继续放毒吗？

答：这我保证不了，我想说就说。我说的都是真理。

问：犯人批判过你吗？

答：批判过。干部也在经常教育，而且做到了仁至义尽。要不，我就不叫朱守忠了。我就是这样，不说反而憋到难受，还生怕说少了。只差枪毙算完，不然还要说。

问：你这样，就判你死罪！

答：死罪就死罪，我无所顾忌。在我来说，没什么，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也！

问：你还有什么说的？

答：没有了。死在宁夏，就是死得其所。“不到黄河心不死”嘛！

这时审判员突然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朱守忠，为什么给你最后一个改造机会你都不愿意呢？”朱守忠平静地说：“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满不在乎。我，就是顽固到底了！”

一九七〇年二月十四日，一个坚持真理、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朱守忠同志为真理英勇地牺牲了！时年五十岁。

在牺牲前的二月五日，正是农历除夕。他挥笔写下一副春联和九首诗，显示了他无畏的革命气概。其中一首诗曰：

以牢为家高枕卧，
美曲新歌由我谱。
杀头枪毙算个啥？
视死如归不在乎。

洪文淑

整理供稿